

冷战后美国的所谓“人权外交”

罗 艳 华

(一)

利用“人权外交”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并不是冷战后西方的新举措,而是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一贯推行的政策和战略,1953年1月15日,美国杜勒斯在国会准备任命他为国务卿的听证会上说,要用和平方法使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一种演进性的变化”,使这些国家“从内部解体”。1977年,卡特政府正式打出了“人权外交”的旗帜,他指出,“尊重人权是自由、民主国家在为扩大影响而进行的和平斗争中最重要的优势,我们应该尽可能有效地运用这种精良的武器。”

里根政府的人权攻势在苏联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效果,到1989年布什接任总统时,苏东国家已进入大变动、大动荡的时期。面对这种有利于西方的形势,布什1989年7月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指出:“我们西方各国要打好一场没有硝烟的新的世界大战,可能要用二、三十年时间。届时,我们将有可能融化社会主义,从而建立起一个以我们西方文明为指导的新世界。”1991年12月25日,社会主义的苏联消失了,美国和平演变的战略终于得逞了。苏联解体后,美国又急不可待地想用人权外交把其和平演变的战略推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此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说:“苏联的崩溃产生了一个世纪才有一次的机会在全世界推行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念。”

苏东大变动之后,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除古巴外)主要集中在东亚地区,而中国首当其冲接替苏联而成为美国利用“人权外交”进行和平演变的主要目标。“六·四事件”则成为美国和西方攻击和诋毁中国的主要借口。对此美国的舆论界明确指出,美国在人权问题上攻击中国,是因为中国已成为美国“主要的新崛起的对手”。“随着苏联共产党政权的解体,供美国人谩骂的‘邪恶帝国’的位置出现了真空。现在有迹象表明中国将填补这个真空,成为美国主要的意识形态对手和美国人在很大程度上感到讨厌的象征。”

为此,冷战后美国把与中国保持关系,不断进行渗透,企图使中国发生和平演变作为主要目标。1990

年5月24日布什总统在关于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讲话中指出:“西方在中国的介入已经促成了成为天安门示威运动基础的重大社会经济变化。”“中国也将出现变化。”1993年克林顿总统入主白宫以后,在中美关系中继承了其前任的如上战略。他在1993年5月28日发表的关于中国最惠国地位的声明中指出,“我们政府决心支持和平的民主改革和转向市场的改革。我相信我们还是能够看到这些原则在中国普遍实行的。”

虽然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仍幻想着他们能使中国发生如同苏东的变化,但中国毕竟不是苏联和东欧。它目睹了苏东的剧变,认真分析这种剧变何以发生的国内外因素,认识到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是内因,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只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若这些国家国内问题处理得好,西方的战略绝不会得逞。为此中国吸取了苏东的经验教训,在把主要精力放在解决国内政治经济问题的同时,在思想领域也开展了反和平演变战略的思想教育活动。由于方法对头,策略得当,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政治稳定。事实已雄辩地证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成功的。西方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如意算盘已经落空。

(二)

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冷战后对发展中国家推行人权外交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冷战结束后,本想分享“和平红利”的西方所面对的却是已持续几年的经济衰退,这大大抵销了西方国家对苏联解体、东欧“西欧化”所本应有的喜悦心情。他们不得不忙于处理国内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以及与俄罗斯和东欧新伙伴的关系问题,仅国内问题就已经使西方世界焦头烂额了,他们既无精力也无时间去更多地关注世界的其他地方。但他们又不愿承认自顾不暇这一现实,总想对别的地区施加影响,特别是对东亚和东南亚这一经济发展蒸蒸日上的地区。于是他们找到了一个简便易行的方法即推行人权外交。因为“谈论人权是一种简单、便宜,又能赢得国内公众

支持的施加影响的方式,它或许还能创造和保持一种卷入的幻想,而且不受很多约束。”

(2) 西方国家在苏联东欧国家和平演变的成功也使得西方国家更加自信地把其价值观念推广到国际关系中。他们认为,既然能使得顽固的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倒向西方,当然也能说服世界上的其它国家采用西方的人权和民主价值观念。而西方发达国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所拥有的经济优势也有助于他们推广其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因为他们是援助国,而发展中国家是受援国,他们可以在进行所谓“援助”时提出附加条件迫使发展中国家接受他们的某些价值观念。把人权与经济援助挂钩是西方推行人权外交的重要手段。

(3) 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也使得西方有必要并有可能改变其对第三世界的政策。冷战时期,西方把共产主义看成最大威胁,把社会主义的苏联看成头号敌人。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都在争夺第三世界。双方都极力向第三世界渗透以防止其落入对方的手中。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国家也对一些第三世界的独裁政府提供了支持。因为这些独裁政府的领导人被认为是反共的,因此应当属于西方集团,这就使得西方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因为自诩为民主国家的美国正在与公认反民主的独裁政权为伍。因此,冷战结束后,对发展中国家推行人权外交成为美国国内斗争的需要。尽管推行人权外交对美国政府来说并不是什么新手法,但在推行人权外交的对象上略加改动就会使一届政府的外交政策显得富有新意。克林顿在竞选时就批评布什过于“溺爱暴君”,从而欺骗民众接受其对发展中国家采取更强硬的人权立场的主张,并由此争得选票。

(三)

人权外交作为一种外交手段与其它外交手段一样,归根到底是要服务于一国的国家利益。美国人权外交的实质是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实现其国家利益。这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是要把美国式的价值观念强加给全世界。国际上公认的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包括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内容,因此维护本国的价值观念就是维护国家利益。但对于美国,它绝不只是维护其价值观念,它的主要目标是向全世界推广其价值观念,让全世界都接受其价值观念。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虽一方面使人不畏艰难,勇于进取,但另一方面也会使人有扩张的欲望。扩张精神从一开始就主宰着美国的外交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超级大国的美国有了向全球扩张的实力。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曾明确指出:“我们赢得的胜利把领导世界的重担持续地放到了美国人民的肩上。”为了“实现领导世界的重任”,美国极力标榜自己是世界的道

义领导,并对维护国际人权负有道义责任。大谈“人权外交”的美国总统卡特也指出,“我们坚定地相信我们民主国家的价值观,相信这些观念仍然是适用的,无论是对穷国还是富国,无论是对北方还是南方,对论是对东方还是西方都是如此……”里根也曾指出:“美国的领导地位就意味着全球范围内对美国道德的普遍承认。”

战后,利用人权外交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战略目标。其最终目的是要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实行资本主义制度。除社会主义国家外,美国也在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推销其价值观念,用施加附加条件等办法强迫一些国家引进美国式的“民主进程”,结果造成一些国家的动荡与混乱。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指出:“想要得到我们的援助,一个非民主政府必须具备以下四个条件。第一,它必须至少给人民一些人权和政治权利,并有希望进行政治体制的和平演变。”1974年的美国国会对外援助法增加款项,决定“对违反国际人权规定的外国政府不提供安全和经济开发援助。”现今的克林顿政府是非常注重把援助与人权方面的进展联系起来的。这一政策也得到了其它发达国家的响应,不仅欧共体对其对话伙伴提出了要把人权方面的改进与今后的经援联系起来考虑,而且身处亚洲的发达国家日本也制定了类似的援助政策。其次,美国把“人权外交”作为补充国力的重要手段。

六十年代美国陷入越战泥潭,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大大加速了其霸权地位的衰落。卡特在七十年代末期提出“人权外交”,正是为了挽救这种局面。对此,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指出:“人权运动可以使美国摆脱战战后处于守势的地位,开始采取进攻姿态……。”里根时期,则更加明确地把人权外交作为增强美国国力的重要手段。这一点在里根于1988年1月20日向美国国会提出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反映得十分清楚。一方面,里根重申人权问题体现了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精神,强调国家安全战略必须从国家所珍视的价值观念出发,并且以保护和加强这些价值观念为最终目的;另一方面里根在历届政府中第一次公开把人权外交视为增强美国国力的重要手段之一,他指出:“国家安全战略的精髓是实力,而国家实力除了军事力量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手段,如人权……等”。

在苏联解体之前,人权外交曾是美国与苏联争霸的重要手段。这表现为在美苏两国实力旗鼓相当的情况下,美国把人权外交看作争取人心的手段,以此来作为对美军事实力的补充手段。对此前美国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艾布拉姆斯一语(下转第53页)

意对部属多表扬少批评,多指引少指责,适时地以目标激励增强号召力,以榜样激励增强说服力,以关怀激励增强向心力,以情感激励增强吸引力,以鼓舞激励增强战斗力。要在抓好业务学习和培训,提高员工工作技能的同时,加强思想工作,不断提高大家的政治思想觉悟,使之牢固确立起爱国、爱行、爱岗思想和主人翁意识,始终保持旺盛的工作斗志和创造热情,展示出商业银行员工的良好形象。

正确处理权力影响力与非权力影响力的关系,强化领导者的人格感召力

首先,要加强人格的自我完善。必须自觉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学习,自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我党的优良作风,自觉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感,养

成严于律己、为政清廉、敬业奉献、拼搏进取、率先垂范的行为习惯,以高尚的人格力量和表率作用,去影响、感化、凝聚部属,带领大家同心同德为实现共同理想和事业目标奋发工作。其次是建立起应有的威望。现代商业银行领导者要树立自己较高的威望,必须勤于钻研和掌握市场经济知识、商业银行运营管理和知识和其他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以广博的知识素养赢得部属的信服;要同上级建立起正常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靠自身素质和工作实绩赢得上级的支持;要放下架子,深入群众,关心、尊重、爱护群众,靠“打成一片”赢得群众的拥戴。另外应磨练出过人的胆识和气质。领导者超人的胆识和气魄能产生一种令人敬佩的情绪感染力。关键时刻的大智大勇,需要有坚实的心理根基,来自于日积月累的磨练。商业银行领导者面对复

杂多变的市场经济环境,要做到稳健经营,稳操胜券,应当是果断而不武断,刚毅而不固执,威猛而不霸道,行动如猛虎,安稳如泰山,愈是紧要关头,愈是沉着冷静,不露声色地静观默察,善于刚柔相济,化解压力于无形,取得胜利于最后。掌握总揽全局、驾驭局势的本领,善于采取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策略,把握局势发展的“火候”和“时机”,巧妙运筹,因势利导,发挥群众的主观能动性,群策群力做好工作,使局势朝着理想的方向发展。

适应市场经济要求,提高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水平,是我们各级领导面临的一个新课题,有待于我们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用心得体会,潜心把握,促使我们不断步入经营管理的新境界。

(作者系中国投资银行济南分行行长)

(上接第 59 页)道破:“我们和苏联之间的人权之争实际上是一场争取人心的斗争,我们必须打赢这场斗争。”冷战后美国对其他国家推行人权外交依然有这方面的考虑。

第三,在推行“人权外交”的过程中采用双重标准,以确保最大限度国家利益的实现。关于美国人权外交的双重标准问题,中美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七十年代,随着苏联实力的增强,美国战后的霸主地位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为了制衡苏联,美国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因为此时美国有了中国这张王牌,就可以使苏联处于腹背受敌的局面。抗衡苏联的战略利益冲淡了美国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而九十年代,在苏联解体,中国日益成为美国所谓新“威胁”的时候,对中国推行人权外交,实行和平演变又成了美国的重要利益。

对于双重标准的问题,里根政府曾有明确的理论依据。里根政府在 1981 年 10 月提交国会的“人权备忘录”中指出,人权应有双重标准,即所谓发扬光大民主价值观使苏联政府陷于窘境的“积极标准”和对盟国侵犯人权行为不必采取行动而只批评一下即可的“消极标准”。因此一方面把原苏东国家作为人权外交的主攻目标,另一方面却对象前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却迟迟不表态。冷战时期其它许多西方在第三世界的盟国均因美国对其有地缘政治或经济利益的考虑则免受侵犯人权的指责。冷战结束后,随着一些国家战略重要性的丧失,这些国家也转而成为美国人权

外交的目标。与此相反,随着东欧 1989 年的剧变和 1991 年苏联的解体,苏东国家的人权问题则一夜之间变得荡然无存了,转而成了美国援助的目标。

第四,美国人权外交的目标是与美国国家的战略目标完全一致的。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目标和对外政策的出发点是对付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战后美国人权外交的目标是苏东国家。七十年代之后,随着美苏争霸的加剧,双方展开了对第三世界的激烈争夺。因而七、八十年代,美国在第三世界支持了大批的独裁政权,其目的是服从与苏争霸的需要。在苏东发生变化之后,美国的人权目标转向了中国。因为这时中国又成了美国的主要战略“威胁”。此外,冷战后,美国内经济社会问题严重,美国想更多地把精力放在处理国内问题上,因此在国际上要“收缩战线”,放弃那些对美国已失去战略意义的“据点”;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便被以“人权状况”为借口抛弃了。

综上所述,美国所谓的人权外交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向全世界推广其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则是把促进人权作为手段,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向不同的对象施加压力,以确保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国家利益。但美国在冷战后推行人权外交的作法表明美国仍在沿用冷战思维的模式,仍在实行强权政治或霸权政治,这与冷战后世界各国试图建立一种健康的国际关系的努力是背道而驰的。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